

探索成年初顯期特徵、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之關聯

陳杏容

研究目的：成人初顯期的觀點已經廣泛應用到西方的實證研究上，然而現有研究缺乏華人多元家庭經濟背景之學生樣本，並同時探究消極與積極心理健康與成年初顯期特徵之關聯。再者，貧困不利心理健康，貧窮者無法自由探索與選擇生活型態，故貧困與非貧之學生在成人特徵與心理健康可能不同。雖然不少文獻支持家庭經濟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然而成人地位是否調節該關聯則缺乏實證。**研究方法：**以網路問卷調查與分析1,444位臺灣與金門的公私立大學生資料以澄清上述議題。**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貧困學生在實驗性、介於中間的得分較非貧困者低。此外，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指出實驗性、專注自我有利心理健康，負面不穩定則增加憂鬱情緒與減弱幸福感；納入成年初顯期特徵後，家庭經濟仍顯著預測心理健康，成人地位具有調節影響力。進一步分析發現，貧困且達成人者其心理健康狀況亟需臨床關注。**研究結論：**基於研究發現建議社會福利資源延續對上大學之弱勢青年的協助以降低貧窮的影響。透過教育宣導與專業訓練，提升校園內對青年心理健康需求的敏感度與處遇能力，並且建立圓夢機制，提高青年探索新事物與專注自我的機會。

關鍵詞：大學生、憂鬱、心理健康、貧窮、幸福感

陳杏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副教授；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工作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兒少與成年初顯期正向發展、心理衛生與臨床社會工作、家庭與學校系統、憂鬱與物質濫用預防與介入性研究。(通訊作者；E-mail: chenbjntnu@gmail.com)

收稿：2020年5月12日；接受：2021年3月7日

一、緒 論

Jeffrey J. Arnett認為青春期末至成年期的過渡具有獨特性，命名為「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他認為青春期末發展的主要特徵是第二性徵的成熟，而成年初顯期則介於青春期末與成年期之中，個體嘗試扮演成人的角色，但未能真正獨立，不論在感情或是工作、學習的發展都還不穩定，掙扎著自我探索但仍保有樂觀性(Arnett, 2016a)。相對地，成人期的個體，不管在工作、學習或關係上的變動小，趨於穩定，也多對他人肩負責任與承諾。相形之下，成年初顯期的年輕人多面臨不穩定與變動性，且有幾個共同明顯的特徵(Arnett, 2016a; Nelson, Badger, & Wu, 2004)，認為人生有各種的「實驗性/可能性」(experimentation/possibilities)，具有高度樂觀，多元探索與追尋自己的理想與興趣。花很多時間進行「探索認同」(identity exploration)，多方探索世界並增加新的體驗，繼而對自己形成內在穩定的看法之外，也逐漸建立對親密關係，工作以及世界的看法。這時期的年輕人通常只「專注在自己」(self-focus)有興趣的事情，對其他事情相對淡漠。「不穩定／負面」(instability/negativity)是這些年輕人的另一個共同特質。為了求學或是尋找理想的工作，搬遷或是跳槽是常見現象，連帶人際關係多變動，伴侶關係比較開放，不輕言定下來。再來，這些年輕人多有「介於中間的感受」(feeling in-between)，常容易感覺自己夾在中間，不像兒少時期的天真無知，邁向獨立的同時卻還未能完全具備成人的能力與肩負責任。但是此特徵是否因為家庭經濟資源差異有所不同，現有文獻立場不一(Arnett, 2016a; Côté, 2014)。Arnett(2016a)的論述中認為成年初顯期的特徵不太受到社經地位的影響，但是一些學者，例如Côté(2014)則持相反意見，並指出在一些區域低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年，生活看似很悠閒，並沒有離家獨立生活，他們並非如Arnett所言，認為這段時間有多種的可能性，可以自由地探索各種生活型態並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上。相反的，他們更可能會因為長久累積的劣勢，缺乏適當的學歷與符合技能的工作機會，若去外地工作，在外地的工作收入，更無法支付高額的生活費用，只能在自己的家鄉社區內遊蕩。儘管Arnett試圖提出一些研究證據來支持其論述，但是研究樣本主要來自美國大學生，而在美國大約只有20%的青年會進入四年制的大學就讀，且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缺乏多元家庭背景(Arnett, 2016a)。

在臺灣脫離中學規律的生活之後，18至25歲青年才有機會進行各項探索，不僅拓展生活圈也經歷更多的變動，這看似符合「成年初顯期」特徵。不同於歐美社會，在臺灣青年普遍會接受高等教育，以2018年資料為例，國中畢業生有99.80%繼續升學，高中生升學率有94.30%，職業科畢業後也有79.42%繼續升學(教育部統計處，2019)。儘管臺灣多數18-25歲年輕人在大學就學，但是家庭社經地位影響進入公立或私立大學的機會(李易駿、古允文，2007；楊瑩，2014；駱明慶，2002)。運用此得天獨厚的特性，透過分析臺灣公私立大學生樣本，本研究得以探究成人初顯期的特徵是否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有所差異，即研究目的一。

此外，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值得探索。一來上大學之後，人際互動、角色扮演與責任承擔都比青少年時期來得複雜，二來自殺是臺灣青年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且與憂鬱情緒有密切關係(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Arnett, 2016a; Boumans & Dorant, 2018)。心理健康除了低度的憂鬱情緒之外，晚近被賦予更積極的意涵。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2019)定義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一種幸福(well-being)的狀態，個體能實現其潛能，因應一般生活壓力、具有工作生產力並得以貢獻其所在社群」。大學生活有許多成長與挫折交織的新經驗，憂鬱與幸福感並非完全互斥，故需同時瞭解兩者，才能周延掌握心理健康狀態(Haworth, DeCoster, White, & Voltz, 2015; Van Dam & Earleywine, 2011)。

儘管已經有不少實證資料支持家庭貧困或是相關風險因子不利心理健康的發展(陳杏容，2016；Boumans & Dorant, 2018; Cho & Lee, 2019)，但是少有相關的研究同時納入該階段的發展特徵一起進行探究。從Arnett的論述中可知，嬰兒期的特徵是依賴，青少年的特徵是第二性徵的成熟與發展，成年初顯期個體進入到一個相對獨立自主的階段，個體可以進行多方探索。雖然會經歷各項不穩定性，以及釐清自己是誰的認同掙扎，然而整體上是處在相對樂觀的時期，且在此時期個體也比兒少階段更有能力因應環境的挑戰(Arnett, 2012)。此外，過往研究也發現發展的特性跟心理健康有關(Baggio, Iglesias, Studer, & Gmel, 2015)。然而，成年初期的發展特性納入考量之後，貧困家庭是否還能顯著影響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態則屬未知，若能釐清這關聯，將能對介入處遇的服務規劃提供更清楚的方向指引。是故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二在於探討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的關聯也將合併探討納入發展特徵後的影響。

在此階段，大多數年輕人認為自己已不是青少年但也未達成人，但是仍有一群人會比同儕較早認定自己已達成年。已達成人跟未達成人者，兩群人是否影響家庭經濟與青年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仍待澄清(Arnett, 2016a; Nelson & Barry, 2005)。既有的研究中發現，在貧窮的家庭中自覺是成人的青年人往往肩負著更多的責任與經濟負擔(Plug, Zeilj, & Bois-Reymond, 2003)。這些年輕人，往往需要身兼數職，無法專注在跟自己年齡相當的課業或課外活動上，即使在學念書也可能持續掛念家裡的狀況(吳書昀，2011；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是故家中的經濟困境會對這些青年人的心理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而對於那些不認為自己是成人的青年人，可能由於他們尚不需要負擔相關的責任，家庭的經濟狀況對其心理健康可能影響較小。然而，這些研究發現受限於小樣本的質化研究或僅是國外的初步發現，實有必要進一步驗證此現象在臺灣的狀況。是故，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在於運用臺灣大學生的資料探究成人地位是否調節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相較於未達成人者，對於已達成人的青年人，家庭經濟貧窮對其心理健康是否更為不利。

增加了解華人社會中大學生的成年初顯期特徵、成人地位與其消極和積極心理健康的關聯，除了有助相關研究領域的拓展，了解華人與西方研究之異同之外，本土資料也提高我們對大學生發展特徵與其心理健康機制之了解，這有助規劃相關政策與實務服務，使其更貼近大學生需求並提升其心理健康。

基於上述，透過網路問卷調查取得多元家庭經濟大學生的樣本，改善先前實證多偏重白人中產階級，樣本取自單一學校或科系的限制，以探究三個目的：

1. 成人初顯期的特徵是否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有所差異。
2. 納入成年初顯期特徵的考量後，了解家庭經濟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關聯。
3. 成人地位是否調節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

(一) 成年初顯期特徵與家庭經濟狀況的關聯

成年初顯期不同於青春期與成人期，而可以獨立成一個階段來看，因其有幾個共同的特徵(Arnett, 2016b; Reifman, Arnett, & Colwell, 2007)。「認同探索」是成年初顯期的主要特徵之一，儘管個體可能從青春期後期開始進行自我認同探索的任

務，但是現代社會18歲以後持續就學者普遍，尤其是大學生階段，個體仍受到家庭與學校保護，利用這個時間探索自己，更清楚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以及將來要做些什麼，具有社會正當性(Smith, Bahar, Cleeland, & Davis, 2014)。這個時期的青年比其他階段的個體，對未來更常覺得有許多「實驗性/可能性」，敢於追求自己的理想和興趣，增加新的體驗，不斷轉換與尋找適合自己的伴侶、工作或是生活型態，這些也反應出，此時期的青年比其他時期更樂觀。相較於國中小學忙於學習，出社會忙於工作，臺灣青年在大學時期比較能「專注自我」，投身於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中，不論是中學被社會文化禁止的交往關係、或是非關課業的活動。各種的探索，以及跟不同人交往以及活動參與的過程，同步拓展對自我與世界的認識。「不穩定性高／負面」是這個階段的特徵，相較於兒少時期多受到家庭的保護，尤其臺灣升學文化，家長多希望孩子心無旁騖，專心唸書，也會盡量降低家庭重大的變動以免影響孩子。上大學之後，這些保護與限制就開始放鬆，個體經歷各種轉換，生活不再如國高中班制式安排，有些人會離家上大學，修課同學隨課程變動，社團或是兼職工作同事的變動，以及親密關係交往前的模糊不確定，甚至經歷分手等，這些都使在成年初顯期的大學生，相較於其他階段有更明顯的不穩定性。再者，年輕人多有「介於中間的感受」，雖然在臺灣民法規定年滿20歲為成年，但是個人對於自我是否是成年的看法，除了年齡的影響之外，家庭與文化因素也不可忽略(Johnson, Beag, & Sirotzki, 2007)。脫離國高中時期，師長與父母的密集的監督，大學生確實有感覺自己已經不再是青少年，可以享有以往沒有的權利與自由(例如：晚回家甚至不回家)。相對地，多數大學生仍無法完全像成人般獨立負擔自己的生活與肩負所有決策的責任，加上學生的身分，家長與社會大眾也不總是以成人方式來與之互動。在這些互動中，個體更可能知覺到自己已經不是青少年但也不是成人。

儘管成年初顯期的青年有上述特徵，但是在不同家庭經濟的青年是否都有類似的特徵，學術界尚未定論，且直接的實證資料依舊很少。少數例外的有，Arnett(2016b)整合網路、手機與室內電話調查資料，分析比較710位受訪者後指出，成人初顯期的特徵在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並無顯著差異。由於這個資料收集方式多元，加上在家庭社經地位的認定上，採用母親學歷做為區隔高中低三種地位(大學或

是更高學歷、專科以及職業學校學歷，中學學歷或以下)，該研究發現是否具有重複驗證性，有待檢視。

部分學者提出「成年初顯期」的特徵是相對於其他發展階段而言，並不代表所有青年擁有相同的生活樣貌(Roy, Messina, Smith, & Waters, 2014)。尤其是生長在貧困家庭沒有繼續就學的青年，平日在社區內遊蕩，偶爾打零工無需趕著打卡上下班，看似過著悠閒的日子，卻可能是貧窮的成長過程未曾獲得足夠的支持以探索興趣並培養專長，故在成年初期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職業與生活型態(Côté, 2014)。

若快速側寫大學生的生活樣貌，除了各科系課業學習安排的差異之外，大學生的生活多圍繞著社團、休閒、工作、人際關係等議題，且通常專注在他們有興趣的事物上，對其他事物反應比較冷淡，這看似跟成年初顯期觀點描述相仿。然而，若仔細觀察教育現場與實證資料，家庭經濟狀況影響青年參與探索性活動的意願；能取得踏上追夢旅程的機會；甚至預設有多少資源可因應追夢過程面臨之挑戰(李金治、陳政友，2004；陳杏容，2018；Cho & Lee, 2019; Guo, 2017; Messersmith & Schulenberg, 2010)。父母經濟佳，能持續為子女投入豐富資源，有利生涯發展的探索，尤其是跟累積社會、人力資本相關的活動，例如：申請海外實習、遊學或是申請同時取得國內與國際雙聯學位的機會，家庭資源也影響青年能獲得多少支持以專心準備國家級或留學考試(李易駿、古允文，2007)。教育現場常發現家庭經濟限制學生的選擇，儘管校內外的補助可資助貧困的學生，但學生仍會因為預期要自付的成本負擔過高降低申請的意願。針對弱勢家庭的研究研究也指出，這些兒少或青年對自我未來發展的期待也較低(胡中宜、彭淑華，2013；陳雅鈴，2006；楊育儀、陳秀芬，2018)。

儘管缺乏直接的實證支持各成人初顯期面向在不同家庭背景上有所差異，上述這些文獻仍說明成人初顯期的特徵可能因家庭經濟狀況有所不同，基於此，本研究假設不同家境的青年在成年初顯期特徵上有所不同。

(二) 家庭經濟狀況、心理健康與發展特徵之關聯

貧窮壓力與心理健康的關聯廣受支持，儘管因果方向尚未有定見。不論是從社會因果(social causation)觀點認為逆境與貧窮壓力導致心理健康問題，或從社會選

擇(social selection)觀點認為心理健康問題使個體難取得高社經地位，繼而不易擺脫貧窮(Burton, 2007; Costello, Compton, Keele, & Angold, 2003; Zorotovich, Johnson, & Linn, 2016)都累積不少支持。貧困者求學階段無法像同儕一樣穿戴潮牌的球鞋與衣服，繼而產生與環境格格不入之感，這些外表物質的差異，甚至可能導致被排擠或霸凌；經濟能力也決定居住區域的品質，並影響與他人的社交機會，這些日常生活都影響個體對社群產生歸屬感或被歧視的感受，也跟心理健康密不可分(陳杏容、陳易甫，2019；Andresen & Havnes, 2019)。

因為貧困家庭的經濟與社會資本通常比較缺乏，當面對困難時，貧窮者通常需要仰賴自己，比較容易處在焦慮與憂鬱的狀態，對未來可能相對悲觀(吳書昀，2011；Arnett, 2016a)。高壓力不僅降低個人對生活美好事物的體驗，壓力賀爾蒙長期維持在高點，容易導致高焦慮感受，降低抵抗力並危害身體健康(賴怡芳，2014；Burton, 2007; Hooper, DeCoster, White, & Voltz, 2011)。一旦有突發事情影響貧困者原來的工作安排，或是意外事件需要額外支付費用，無法依靠家庭經濟支持，個體甚至對自己無法幫忙家庭有罪惡感，這些可能提高憂鬱或其他精神疾病產生的機會(Roy et al., 2014)。

另一方面，青年的心理健康和其發展特性(如自我認同探索、實驗性與不穩定等)亦有不可輕忽之關聯。例如Lisha等人(2014)發現，成年初期的特徵與高壓力以及不容易做決定有高度正相關並影響大麻使用的經驗。研究團隊認為這是因為青年喜歡嘗試新事物，但是面對各種轉變的壓力，卻無法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或許下承諾。Baggio等人(2015)探究成年初期特徵與憂鬱和幸福感的關聯。以結構方程模型分析5223位來自三個軍人招募中心的男性，並指出憂鬱情緒、幸福感和成年初期的特徵(認同探索、實驗性、負面)之間的關聯性達顯著差異。此是該領域少見涵蓋不同教育程度樣本之研究，極具參考價值，但是受訪對象來源來自國家軍事招募中心與性別影響其推論性。

考量有實證資料顯示，成年初顯期的發展特性會影響青年的心理健康，研究目的二將納入發展特性的考量之後，進一步爬梳家庭經濟狀況與該階段個體心理健康的關聯。

(三) 成人地位調節家庭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當多數青年在成年初顯期認為自己不是成人也非青少年，有部分人自認是成人。成人往往代表獨立、完成學業、進入工作、肩負照顧自我或家庭的責任(Arnett, 2016a)。Nelson與Barry(2005)是少數探討心理、行為健康跟成人地位關聯的研究，他們發現自覺是成人者相較於同儕憂鬱情緒低，也比較不會從事酒駕與吸毒等危險行為。研究者對這結果的解釋是這些自認已經是成人者，較少自我認同混淆，有穩固的人際關係。儘管該研究初探的發現有助瞭解已達成人與未達成人這兩個群體之異同，但是研究推論受限於該樣本來自同一所大學研修相同課程的學生，加上美國高學費，容易排除掉貧困家庭青年。雖有樣本的限制，該研究提供我們初步了解，對於非貧困家庭且自認已達成人之大學生而言，成人代表個體對自己更了解，遠離輕率求刺激的生活型態能掌握生活，甚至擁有比較穩定的關係。

另一方面，由現有研究弱勢家庭子女的文獻來看，認定自己是成年者其心理健康狀況可能跟Nelson與Barry(2005)的研究發現不同。一般家庭鼓勵青年子女獨立的過程，常提供所需的物質與情緒支援，相對於生長在貧困家庭中，個體容易因為經濟限制物質或是休閒活動的選擇，甚至未能如期繳交學校的費用，這些外表明顯跟同儕不同之處，容易帶來負面的反應，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經歷微型被侵略(microaggression)或甚至明顯的歧視，這些經驗都不利心理健康。

貧困學生在轉變成獨立自主的成人過程，因為知道家庭經濟與社會資本薄弱，更常有要靠自己的體認，遇到重大困境沒有足夠的支持，無助與無力感難免產生，這更加速惡化憂鬱情緒(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而承擔成人角色的青年可能常想著要如何省錢才能過日子，同時要避免拖延特定帳單(例如：水電費)導致生活失序。部分兒少家庭照顧者要幫忙照顧年幼手足或生病家人，即使上學也常會擔心家人能否規律吃飯、會不會出現傷害自我或他人的行為(吳書昀，2011)。有些人還要打工支付自己與家庭的開銷，這些都限制當事人參與同年齡者的活動，甚至影響同儕關係與身心健康(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這些已經承擔成人角色的青年，貧困家庭對其心理健康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相對於同樣在貧困家庭中，但是仍不認為自己是成人的青年人，還無須負擔沉重的責任，家庭經濟對其心理健康影響可能相對較小。

基於上述，本研究假設，認為自己已經達到成人者，貧困的家庭環境越不利其心理健康，研究目的三檢視成人地位是否調節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之關聯。

二、研究方法

(一) 資料收集過程與樣本介紹

本研究針對臺灣與金門地區的大學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在有限的研究資源下，預設1,500位受訪者。網路問卷規劃是比照Arnett(2016a)對成年初顯期大學生的調查方式，而為弭補過去研究少涵蓋不同家庭經濟背景者之遺憾，並考量臺灣公私立大學生之家庭經濟狀況分布傾向，網路問卷招募受訪者的策略是廣泛涵蓋臺灣北中南東以及金門地區的公私立大學生，以提高網羅各種家庭經濟背景學生的可能性。首先設定各區都至少有一所公立與私立大學，每所學校100人，例外的是金門區只有公立大學，再者兼具考量各區域公私立大學及學生數目，在公立學校抽樣數規劃上，北部2所，中部1所，南部1所，東部1所，金門1所，私立學校抽樣數規劃，北部5所，中部2所，南部2所，東部1所。針對各區抽樣出的大學與科系，先以電子公文與電話聯繫各系所的秘書、助教等可以接觸學生的關鍵人士，請其協助轉貼資訊給學生，並依據各區學系答覆狀況，強化聯繫抽樣學系，邀請其協助轉發網路問卷資訊。以抽獎後得獎者可獲得500或是300元的超商禮券作為激勵與酬謝填答者，且計畫結束前，由研究者與助理共同署名謝卡，送達這段時間協助進行調查的各系所相關人員以表謝意，此研究通過筆者任教學校之倫理審查。最後各區與公私立學校數如規劃執行，刪除問卷嚴重漏答者¹，分析樣本有1,444人，總計有594位公立與850位私立學生。

1 原始問卷共有7大題，受訪者明顯漏答超過2大題以上則進行全面刪除。

(二) 測量工具

1. 心理健康

過去有認為低憂鬱情緒或無病即代表心理健康(陳婉琪、徐崇倫, 2011), 而持不同意見者建議用幸福(well-being)作為測量心理健康的核心概念(WHO, 2019)。儘管幸福與憂鬱情緒常有中度負相關, 但是在低憂鬱情緒下, 也有可能出現低幸福感受; 反之亦然, 故無法以其中一概念取代另一概念(Haworth et al., 2015; Van Dam, & Earleywine, 2011)。本研究同時採用兩者作為心理健康之測量, 除了反映學術現況, 也提高結果作為自殺預防與幸福感促進的實務與政策運用價值。

(1)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的測量採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Revised (CESD-R)共有20題目。請受訪者依照過去一周內的實際情況或感覺出現的天數回答, 0代表幾乎沒有或少於一天, 1代表「1~2天」, 2代表「3~4天」, 3代表「5~7天」。幾乎每天都出現且持續兩周時則選4。不論在社區($n = 7,389$)或學生樣本($n = 245$)此量表皆有良好的信效度(Van Dam & Earleywine, 2011)。本研究執行前CESD-R官網並無中文版量表, 但有英文說明可無償供研究使用, 故團隊自行翻譯CESD-R, 諮詢具有中英雙語能力者與精神科醫師, 也以五位大學生預試確認翻譯文字符合其文化理解力。依照量表使用建議, 選項4重新編碼為3, 將反向題反轉編碼, 總加所有20題, 分數越高代表憂鬱情緒越高, 16分以下不具有臨床診斷性, 反之可能符合憂鬱診斷(CESD-R, n.d.)。Cronbach's alpha係數為 .93。

(2) 幸福感量表

採用WHO-5量表測量個體主觀幸福感受, 中文版的信效度良好(Lin et al., 2013)。共有5題, 例句「我感到情緒開朗且精神不錯」, 為六點量表, 分數從0至5。所有題目總加, 分數越高代表幸福感越高。Cronbach's alpha係數為 .91。

2. 成年初顯期面向量表²

使用成人初顯期面向量表(The Inventory of the Dimensions of Emerging Adulthood / IDEA)有良好的信效度(Reifman et al., 2007)，共有31題。該量表除了涵蓋成年初顯期的五個面向之外，另有一個相對的面向，專注他人(Other-focused)，過去研究採用IDEA也同時涵蓋此面向，一起用在檢測成年初顯期特徵與心理健康或健康行為的關聯(如：Smith et al., 2014; Skulborstad & Hermann, 2016)，加上專注他人的測量意涵有對他人負責、貢獻，具備促進積極心理健康(WHO, 2019)，故納入本研究中。探索認同(Identity exploration) 7題；實驗性/可能性(Experimentation/possibilities) 5題；負面/不穩定(Negativity/ instability) 7題；專注自我(Self-focused) 6題；專注他人(Other-focused) 3題；感覺介於中間(Feeling in between) 3題。Cronbach's alpha分別為.84、.81、.75、.64、.65與.53。所有面向，選擇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稍微不同意」，3「稍微同意」，4「非常同意」。反向題反轉編碼後總加題目，以負面／不穩定為例，分數越高代表負面／不穩定越嚴重。

3. 成人地位

受訪者回答是否認為自己是成人，選項(1)是、(2)否、(3)某些方面是，某些方面不是。進行迴歸分析時重新編碼，合併(2)與(3)後編碼為(0)，保留選項(1)。

4. 家庭經濟

測量家庭經濟狀況，過往研究有採用客觀指標(如：家庭收入)，主觀自評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呈現家庭社經地位的方式(呂朝賢、陳柯玫、陳琇惠，2016；楊育儀、陳秀芬，2018；Arnett, 2016a; Roy et al., 2014; Zorotovich et al., 2016)。本研究探究青

2 額外執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EFA)，根據特徵值大於1以及陡坡圖建議，限定6個因素後再次分析，使用promax變異的轉軸，各題目的負荷值都大於.3可對應在原先六個次量表的概念，只有一個例外是第10題。若使用最大變異轉軸，各題目的負荷值都大於.3可對應在原先六個次量表的概念，有2個例外，即第10題(樂觀的時間)與23題(獨立於父母的時間)並無落在原先的自我、認同的量表上。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結果顯示，模型議RMSEA = .068，CFI = .817，說明模型配適度落在可接受的範圍。詳細請看附錄一。量表的因素結構與國外大致相符，故維持原來的題組記分。

年感知的家庭經濟狀況與其心理健康之關聯，故採個體主觀自評：(1)貧困、(2)勉強餬口、(3)中等與小康、(4)比小康好些、(5)富有。由於貧困與富有的受訪者比例低，故分析時重編碼為(1)貧窮，整併選項1與2，(2)小康，(3)富有，整併原選項4與5。當分析所關注的是貧窮與非貧窮的異同時，則進一步合併小康與富有，編碼為(0)代表非貧窮，用來跟(1)貧窮作比較。該變項也跟成人地位(是否達到成人)後製成交互變項。

5. 人口背景控制變項

性別與年齡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國內青少年研究也多發現女性比男性有較高的憂鬱情緒(陳杏容，2016；陳婉琪、徐崇倫，2011)。本研究著重受訪者主觀的家庭經濟狀況對其心理健康之影響，但考量父母教育程度多涵蓋在社經地位變項之中，而低社經地位不利心理健康，故在進行迴歸分析時，除了年齡與性別，也控制父母之教育程度。

(1)年齡

大學生自填實歲年齡。

(2)性別

男女生編碼1代表女性、0代表是男性。

(3)父母親教育程度

大學生填答父母親之教育程度。因國小或以下者，人數百分比低，分析時合併編碼為(1)國中(含)以下、(2)高中、(3)大學或專科、(4)研究所(含醫學院)以上。由於父母教育變項有 .6 的相關，故本研究使用兩者之平均數，以避免在迴歸模型有共線性的問題。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有三個目的與一個假設，基於文獻研究者認為不同家境青年在成年初顯期特徵上有所不同。本研究採用SPSS Statistics 23.0版統計軟體，先對所有變項進行描述統計，量表進行信度Cronbach's alpha分析，再了解變項間的關聯。針對研究目的一與假設，先用單因子變異數瞭解貧窮、小康與富有三類家庭在成年初顯期特徵

的面向上是否有差異，達顯著差異後，接續採用事後比較。在回答研究目的二與三之前，額外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三類家庭經濟狀況在憂鬱、幸福感上是否有差異，以t檢定了解成人與否在憂鬱、幸福感上是否有差異。針對目的二，對憂鬱情緒與幸福感分別執行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模式一預測變項包括三個人口學控制變項與成年初顯期特徵，模式二則放入家庭經濟狀況(貧窮vs.非貧窮)、二類別之成人地位(成人vs.非成人)兩個變項。成年初顯期特徵的面向需要跟其中一個心理健康測量(憂鬱情緒或幸福感)達到顯著相關才會留下來，且確認整體模型無違反統計假設診斷後才採迴歸分析。針對研究目的三，階層迴歸模式一與二如同目的二的安排，模式三則放入家庭經濟與成人地位之互動項，若達顯著差異則進一步用PROCESS巨集程式³檢測成人地位的調節影響力。

三、研究結果

表1人口背景資料，總共有1,444人，超過7成是女性。年齡主要介於19歲至21歲。超過74.2%自認家庭中等與小康(1,072人)，其次有14.8%自認家境勉強可餬口(214人)，另有9.8%學生自認家境比小康好些(142人)，1.0%學生自認家庭貧困(15人)，1位學生認為家境富裕。母親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或是大學(專)，各佔約40%，父親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為主(42.4%)。

有29.8%學生(430人)自認是成人，2.7%(39人)的學生未達成人，而67.5%學生(975人)自認介於中間。認同探索介於7—28分，平均為24.08；實驗性介於5—20分，平均為17.16；負面／不穩定介於9—28分，平均為21.89；專注自我介於7—24分，平均為18.66；專注他人介於3—12分，平均為8.05；介於中間的得分從3分到12分，平均為9.68。憂鬱情緒介於0—60分，平均為15.38；幸福感介於0—25分，平均為13.71。

3 由Andrew F. Hayes博士所發展，可下載程式至SPSS等統計分析軟體上，以檢測調節變項之影響力，引用網址：<http://processmacro.org/download.html>。其他Dr. Hayes相關資訊www.guilford.com/p/hayes3

表1 主要變項描述統計(N = 1,444)

變項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全距
性別			
女生	76.1%		
男生	23.9%		
年齡			
18	14.7%		
19	24.4%		
20	22.7%		
21	22.9%		
22	9.0%		
23	3.3%		
24	1.9%		
25	1.0%		
家庭經濟			
貧困	1.0%		
勉強餬口	14.8%		
中等與小康	74.2%		
比小康好些	9.8%		
富有	0.1%		
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	3.0%		
國中	9.2%		
高中	40.5%		
大學或專科	40.2%		
研究所(包含醫學院)以上	7.1%		
父親教育程度			
國小	3.2%		
國中	11.4%		
高中	31.0%		
大學或專科	42.4%		
研究所(包含醫學院)以上	12.0%		
成人狀態			
成人	29.8%		
不是成人	2.7%		
介於中間	67.5%		
成年初顯期特徵			
認同探索	24.08	3.23	7 ~ 28
實驗性	17.16	2.44	5 ~ 20
不穩定	21.89	3.30	9 ~ 28
專注自我	18.66	2.53	7 ~ 24
專注他人	8.05	1.85	3 ~ 12
介於中間	9.68	1.57	3 ~ 12
心理健康			
憂鬱情緒	15.38	12.17	0 ~ 60
幸福感	13.71	5.13	0 ~ 25

表2 不同家境背景青年在成年初顯期面向的分數

	貧困(a)		小康(b)		富有(c)		<i>F</i>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認同探索	24.11	3.45	24.03	3.19	24.46	3.20	1.151
實驗性	16.81	2.61	17.15	2.43	17.78	2.11	6.931** c>b>a
不穩定	22.35	3.28	21.81	3.27	21.76	3.52	2.652
專注自我	18.68	2.80	18.63	2.44	18.86	2.79	.505
專注他人	7.99	2.00	8.09	1.81	7.84	1.88	1.299
介於中間	9.38	1.78	9.72	1.51	9.80	1.58	4.95* c>b, c>a

* $p < .05$; ** $p < .01$; *** $p < .001$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假設一得到部分支持。實驗性與家庭經濟狀況達到顯著差異， $F(2,1441) = 6.931$ ， $p < .01$ 。Games-Howell事後檢定顯示家境小康者比貧困者得分較高(17.15 vs. 16.81)，表2顯示家境富裕者比家境小康(17.78 vs. 17.15)或貧困者得分較高(17.78 vs. 16.81)。感覺介於中間與家庭經濟狀況達到顯著水準， $F(2,1441) = 4.95$ ， $p < .05$ 。Scheffe事後分析顯示家境富有者比貧困者(9.80 vs. 9.38)與小康得分更高(9.80 vs. 9.72)。其他面向與家庭經濟並未達到顯著水準。認同探索與家庭經濟狀況未達到顯著水準， $F(2,1441) = 1.151$ ， $p = .32$ 。不穩定與家庭經濟狀況未達到顯著水準， $F(2,1441) = 2.652$ ， $p = .07$ 。專注自我與家庭經濟狀況未達到顯著水準， $F(2,1441) = 0.505$ ， $p = .60$ 。專注他人與家庭經濟狀況未達到顯著水準， $F(2,1441) = 1.299$ ， $p = .273$ 。

表3呈現主要變項間的相關，憂鬱與幸福的相關是 $-.62(p < .01)$ ，控制變項除了性別以外，年齡與教育程度至少跟其中一個心理健康指標有相關。貧窮與憂鬱的相關是 $.12(p < .01)$ ，和幸福感相關是 $-.12(p < .01)$ ；成人地位與幸福感有 $.09$ 相關($p < .01$)。成年初顯期各面向至少都跟其中一個心理健康指標有相關，除了介於中間例外。進一步採用階層迴歸分析回答研究目的二與三之前的額外分析顯示，憂鬱情緒與家庭經濟狀況的ANOVA分析達到顯著水準， $F = (2,1441) = 11.08$ ， $p < .001$ 。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家庭經濟貧困者其憂鬱情緒得分(18.79)顯著高於家庭經

表3 主要變項間的相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憂鬱	-												
2.幸福	-.62**	-											
3.性別 (1=女, 0=男)	-.04	-.01	-										
4.年齡	.09**	-.07**	-.09**	-									
5.父母教育	-.03	.06*	-.06*	-.03	-								
6.貧窮	.12**	-.12**	-.02	.01	-.28**	-							
7.成人	-.03	.09**	-.11**	.26**	-.03	.07**	-						
8.認同探索	-.10**	.17**	-.01	-.01	.07**	.004	.02	-					
9.實驗性	-.17**	.20**	.02	-.08**	.07**	-.06*	-.04	.64**	-				
10.不穩定	.31**	-.29**	.04	.04	-.001	.06*	-.02	.18**	.12**	-			
11.專注自我	-.26**	.34**	.02	.02	-.02	.002	.09**	.52**	.44**	.02	-		
12.專注他人	-.08**	.13**	-.06*	.01	-.04	-.01	.11**	.10**	-.01	.11**	.39**	-	
13.介於中間	-.03	.05	.12**	-.07*	.05	-.08**	-.14**	.48**	.37**	.26**	.27**	.10**	-

* $p < .05$; ** $p < .01$; *** $p < .001$

濟為小康(14.82)或富有(14.07)者。在幸福感的部分，ANOVA的分析達到顯著水準 $F = (2,1441) = 12.06$ ， $p < .001$ ，Scheffe事後比較顯示家庭經濟為小康(13.88)或富有(14.66)者其幸福感得分顯著高於家庭經濟為貧困(12.28)者。此外， t 檢定結果顯示成人與否與憂鬱情緒未達顯著水準($t = 1.29$, $p = .20$)，即不論受訪者是成人或非成人其憂鬱情緒沒有差異。然而，成人與否與幸福感達顯著水準($t = -3.27$, $p < .01$)，自述為成人者的幸福感分數較高。

表4的模式一可以解釋18.2%憂鬱情緒的變異量，年齡達到顯著水準($\beta = 0.06$, $p < .05$)。實驗性($\beta = -0.14$, $p < .001$)與專注自我($\beta = -0.20$, $p < .001$)越高憂鬱情緒愈低，另一方面，受訪者在負面不穩定($\beta = 0.33$, $p < .001$)得分越高，憂鬱情緒得分也越高。在模式二，整體模型可以解釋19.0%憂鬱情緒的變異量，在控制人口與成年初顯期特徵後，貧窮仍達到顯著水準($\beta = 0.09$, $p < .001$)。表5當中的模式一幸福迴歸模型可以解釋21.4%幸福的變異量，年齡達到顯著水準($\beta = -0.05$, $p < .05$)。實驗性($\beta =$

表4 憂鬱模型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女生	-.12	.69	-.04	-1.2	.69	-.04	-1.3	.69	-.05
年齡	.48	.19	.06*	.57	.20	.07**	.57	.20	.07**
父母教育	-.44	.36	-.03	-.06	.37	-.0001	-.13	.37	-.01
認同探索	.15	.13	.04	.12	.13	.03	.14	.13	.04
實驗性	-.70	.16	-.14***	-.66	.16	-.13***	-.66	.16	-.13***
不穩定	1.22	.09	.33***	1.19	.09	.32***	1.19	.09	.32***
專注自我	-.98	.15	-.20***	-.97	.15	-.20***	-.98	.15	-.20***
專注他人	-.29	.18	-.04	-.24	.18	-.04	-.24	.18	-.04
貧窮=1				3.13	.83	.09***	1.30	1.02	.04
成人=1				-.105	.66	-.04	-.19	.73	-.07*
貧窮×成人							4.99	1.65	.10**
ΔR^2		--			.009***			.005**	
R^2		.187***			.196***			.201***	
Adj. R^2		.182			.190			.194	

* $p < .05$ ；** $p < .01$ ；*** $p < .001$ ；*B* = 未標準化係數；*SE* = 標準誤； β = 標準化係數

0.11, $p < .001$)與專注自我($\beta = 0.28, p < .001$)或專注他人($\beta = 0.06, p < .01$)越高則幸福感越高，另一方面，負面不穩定($\beta = -0.31, p < .001$)的得分越高，則幸福感越低。在模式二，整體模型可以解釋22.5%幸福的變異量，在控制人口與成年初顯期特徵後，貧窮($\beta = -0.09, p < .001$)與成人地位($\beta = .08, p < .01$)仍達到顯著水準。

針對研究目的三，從表3憂鬱情緒的模式三，可知模型解釋19.4%憂鬱情緒的變異量，貧窮與成人地位的交互變項($\beta = 0.10, p < .01$)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成人地位調節家庭經濟與憂鬱的關係。PROCESS巨集程式檢測結果顯示當不認為是成人時，貧窮者的憂鬱分數比非貧者高1.31，但其差異未達顯著水準($p = .20$)。當認為是成人時，貧窮者的憂鬱分數較非貧者高6.29分($p < .0001$)。

從表5幸福的模式三，可知模型解釋22.7%幸福的變異量，貧窮與成人地位的交互變項($\beta = -0.07, p < .01$)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成人地位調節家庭經濟與幸福感的關係。PROCESS巨集程式檢測結果顯示當不認為是成人時，貧窮者的幸福感分數比非貧者少0.71，但其差異未達顯著水準($p = .09$)。當認為是成人時，貧窮者的幸福感分數比非貧者少2.26($p < .0001$)。

表5 幸福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i>B</i>	<i>SE</i>	β
女生	-.08	.28	-.01	-.04	.28	-.004	-.02	.28	-.001
年齡	-.17	.08	-.05*	-.24	.08	-.07**	-.24	.08	-.07**
父母教育	.36	.15	.06*	.21	.15	.03	.23	.15	.04
認同探索	.0001	.05	.0001	.01	.05	.01	.01	.05	.003
實驗性	.23	.07	.11***	.22	.07	.11**	.22	.07	.11**
不穩定	-.48	.04	-.31***	-.46	.04	-.30***	-.46	.04	-.30***
專注自我	.56	.06	.28***	.55	.06	.27***	.55	.06	.27***
專注他人	.17	.07	.06*	.14	.07	.05*	.14	.07	.05
貧窮=1				-1.28	.34	-.09***	-.71	.42	-.05
成人=1				.87	.27	.08**	1.15	.30	.10***
貧窮×成人							-1.55	.68	-.07*
ΔR^2		--			.012***			.003*	
R^2		.218***			.230***			.233*	
Adj. R^2		.214			.225			.227	

* $p < .05$; ** $p < .01$; *** $p < .001$; *B* = 未標準化係數 ; *SE* = 標準誤 ; β = 標準化係數

額外的PROCESS巨集分析顯示憂鬱情緒分數在非貧窮之未達成年這群人的分數(簡稱普未成人)是15.45分、貧窮未達成年這群人(簡稱貧未成人)有16.76分、非貧窮已達成年這群人的分數(簡稱普成人)有13.51分而貧窮且已達成年這群(簡稱貧成人)則高達19.80分；幸福感分數部分，普未成人有13.57分、貧未成人是12.86分、普成人有14.72分，貧成人只有12.46分。圖1與2呈現不同成人地位之下，家庭經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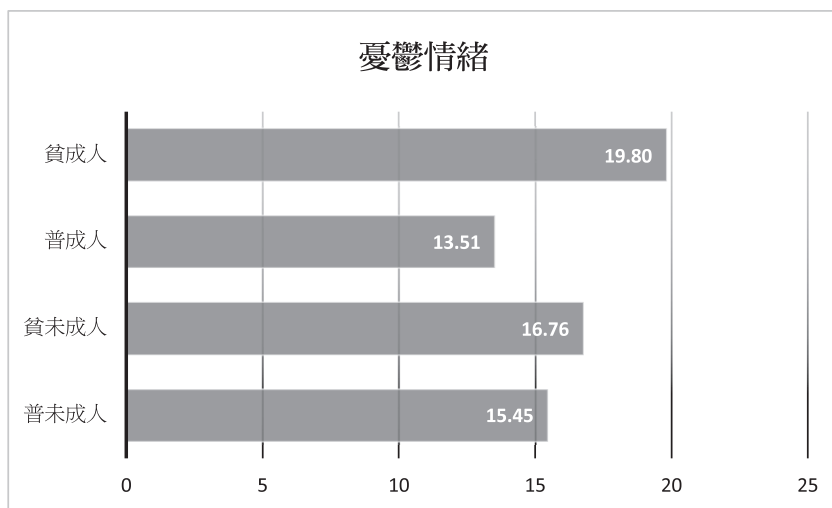


圖1 不同家庭經濟與成人地位下狀況下，憂鬱情緒的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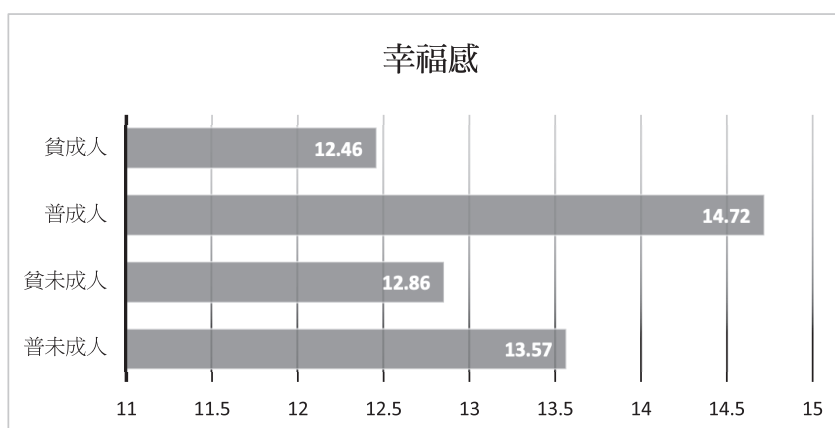


圖2 不同家庭經濟與成人地位下狀況下，幸福感的分數

四、討論與結論

(一) 討論

1. 成年初顯期特徵與家庭經濟的關聯

本研究發現成年初顯期的實驗性與介於中間會因家庭經濟有所不同。富裕青年比小康或貧困青年更認同此時期是一段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嘗試新事物及擁有很多選擇的時間。從文獻與實務觀察中，研究者提出可能的解釋。一來，大學生的生活多圍繞著課業、社團、親密關係、打工、職業探索或是其他休閒(李金治、陳政友，2004；陳杏容，2018；Nelson & Barry, 2005)，參加活動都會消耗時間成本，這對於需要兼職的貧困學生來說是種奢侈，故可能限縮他們自由探索的程度。國內針對貧困大學生的質化研究指出，儘管大部分受訪者不怨恨家庭無法提供更多金錢上的支持，也習慣凡事依靠自己(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但是這些研究也發現，這些家庭經濟支持差的學生忙著回應各種生活要求，尤其花很多時間賺取大學生活所需的花費，並比同儕更急迫的想盡早確定職業方向，以確保畢業後能順利投入職場賺錢。因此，在進入大學後，相較於同儕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參加多元的活動，或有閒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些經濟弱勢學生的時間往往得花在與基本生存條件有關的活動上(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胡蘭沁(2007)針對全臺灣大學生的研究也發現，家庭經濟狀況會影響大學生的兼職工作狀況。家境越佳的同學，工讀的比例越低。家庭社經地位越差的學生，工作時數越長且工讀的經歷越多，也有更高比例是因為要「貼補家用」與「賺取個人生活所需」而工作。

再者，早年台灣勞動部門針對大學生打工的調查就發現私立學校打工比例(43.2% vs. 35.3%)高於公立學校；若依照家庭經濟背景來分，低收入戶完全無相關者的比例(74.4%)高於家境尚可(67.4%)、家境小康以上者(67.9%) (勞動部，2006)。而數字科技(2019)分析全台最大打工APP(小雞上工)的數據後也發現，有超過五成的暑假打工人力(54.94%)來自大專院校，且前十名都是私立大學。學生暑假打工的動機，最主要是要賺取零用錢與生活費(93.9%)。此外，也有44%學生表示要打工賺學費，該研究團隊認為這反應了私校學生的生活費與學費壓力大。

由上述資料，可合理推想，家境差的學生打工更可能比較是因為生活所需，而並非以興趣或是專業發展為考量。若同時納入結構性因素，家境差的青年有較高比例進入學費比較貴的私立大學，加上公立大學的學生工讀的時薪待遇可能比較有優勢(陳世佳，2008)，此不難猜想貧困大學生，尤其是在私立大學就讀的學生，需要更長的打工時數來換取足夠生活的費用(楊瑩，2014)，這也相對排擠參與其他活動的可能性。

再來，家庭經濟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成本的投資，沒有經濟後顧之憂的學生較能自由選擇並參與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包括成本高的探索性活動，例如遊學或是出國當交換生(陳杏容，2018；陳雅鈴，2006)。至於小康或富裕青年有較高「介於中間」的感受，這或許是經濟有餘力的家長更傾向保護孩子，即使在大學階段，這些家長也盡力提供孩子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或機會，這些青年更無後顧之憂可以從事各種嘗試，這一方面拓展對世界多元的認識，也同時使其更深刻體會人生有各種可能性，若這些探索性的活動持續仰賴家庭的支持，青年更會有介於中間的感受。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探索認同、不穩定、專注自我與其他面向上沒有差異，這說明該發展階段的大學生仍有共通特質(Arnett, 2016a; Guo, 2017)。不同家境受訪者在認同探索上沒有差異，或許是因為本樣本全部是大學生，大學這段制度性的延遲(period of institutionalized moratorium)，提供多元機會以拓展視野與經驗，個體可盡情探索自己的價值觀了解喜惡，進而對自己是誰有更清晰的想法(Côté, 2006; Smith et al., 2014)。再者，不論家境如何，青年擺脫國高中制式的學習與升學目標後，比較可以專注在自我有興趣的事物上，加上台灣的大學生，大多還沒有成家立業，因此專注在其他面向(如對他人承諾與責任)的程度差異可能不大。不同家境的學生，在不穩定部分並未達顯著水準，一個可能是因為大學生的學習經歷，在一些變動或負面議題上多有共同性，使其差異比較小，例如時間管理、同儕或是親密關係變動、生涯不確定，這從廣受年輕人喜愛的匿名交流平台Dcard，以及國內的學生輔導中心常針對這些議題舉辦講座，或提供個別與團體諮商輔導服務可窺見一、二(Dcard, n.d.)。另一面，也有可能是本研究方法的限制，使我們無法招募到生活極度變動與負面的受訪者。畢竟生活貧困長期處在極端不穩定家庭的年輕

人，要能克服逆境成功上大學的機率更小，即使他們上了大學，可能會因為過於忙碌，上網花時間填寫問卷的意願較低。

2. 發展特徵、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變異數與迴歸分析的結果都呼應過去文獻中對貧窮不利心理健康的討論(Arnett, 2016a; Andresen & Havnes, 2019; Zorotovich et al., 2016)。而且，在考量發展特徵的影響之後，家庭貧窮仍可有效預測心理健康，由此可知，儘管在成年初顯期階段，個體相對於兒少時期更自由與獨立，但是他們的心理健康還是跟家庭狀況緊密相關。現有國內針對大學生的質性訪談提供部分資訊，讓我們了解當青年有能力透過打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需要像兒少階段仰賴家庭支持時，為何他們心理健康仍受到家庭經濟的影響。例如賴怡芳(2014)訪談了11位有兼職工作的大學生，這些受訪者有著超齡的成熟與責任感，且多因為家庭無法支付其生活費用，想分擔家計或被要求分擔家計而投入打工，一些受訪者在上大學之前就有豐富的打工經驗，有些受訪者的家庭不僅貧困且關係極度衝突，受訪者無法從家庭獲得支持反而感到沉重的壓力。儘管賴怡芳訪談對象跟過去針對貧困大學生的訪談研究一樣，不少受訪者都會說，盡量不讓工讀影響上課學習(例如：陳杏容，2018)，但是賴怡芳的質化訪談中受訪者進一步坦然的分享，儘管排班不跟課堂衝突，但不時會因為打工的過度疲憊而影響上課學習的效率，或因為打工太累，身體與精神上無法負荷，生病或是請假，而研究者也發現打工還是會影響學業，受訪者「緊張的時間表，如同上緊發條的機器日子，有些人在考試前或是交作業的期限之前臨時抱佛腳」(賴怡芳，2014：81)。對於非常需要錢的學生，可能一天內有2~3個兼職或排班，中間夾著去上課的時間，每日都在趕場而累積的疲累沒有適度的休息時間，這些可能是貧困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寫照(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

除了打工以外，貧困家庭的學生也會憧憬一般大學生活，參與學會或學校的社團，但可能因為打工與課業佔滿時間，很難經常參與活動與同儕共遊(陳杏容，2018)。賴怡芳的質化訪談中，有受訪者進一步點出，由於工讀的安排佔據自己太多時間，反而導致社團出席率很低，跟社員的互動接觸少，有些同儕對他們有不合群、不好相處、不在乎或甚至不負責任的觀感(賴怡芳，2014)。

超過身體與精神負荷的打工與課業，以及社團活動無法常常參加，上課後匆匆趕場缺乏與同儕交流，產生團體邊緣人的感受，甚至可能被同儕誤解而多有負面評價，這些都說明即使青年有能力透過工讀等方式來降低家庭經濟壓力，為何他們心理健康狀況也比較差。此外，因為經濟貧困往往與其他風險因子共生，尤其是家庭關係極度衝突或疏離，照顧負荷過重等議題，在這樣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成長的經驗讓他們覺得家人不一定可以依靠，而周遭的朋友或甚至老師往往因為生活經驗不同，無法了解貧困青年他們的生活狀況、面臨的困境，也因此這些青年可能從兒少階段就產生「靠自己」的生存信念(陳杏容，2018；賴怡芳，2014)。為了工作、學業以及家庭問題忙得團團轉者，可能相對不太有多餘的時間發展深入的人際關係，有些人也很少將自己的事情告訴他人，長期的孤寂感以及沒有依靠感，也不利其心理健康的發展。

3. 成人地位的影響

本研究中有超過六成的學生認為自己某些方面是成人，某些方面不是成人，這與國內一份調查研究有相近的發現(廖小雯、程景琳，2011)。此外，本研究發現成人地位調節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的關聯。在自認自己是成人的青年中，家境貧困對他們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更大：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貧困成人的幸福感最低且CESD得分超過16分臨床的警戒點，需要特別關注。若只看本研究非貧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我們發現已達成人者的憂鬱情緒比未達者來得低分。這個發現與Nelson與Barry(2005)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相似。

為何已達「成人」的貧困者相對於已達「成人」之非貧困者有較差的心理健康狀況呢？本研究提供幾點可能的解釋。一方面，成人代表的意義對不同家境青年可能有所不同，這些過程影響青年的心理健康。對高社經青年來說，成人代表個體更能獨立自主決定，有更多個人發展的機會與可能性，對低社經青年而言，成人代表成家、工作以及有更多經濟壓力與責任，因此成人帶來的不是享受自由決定的自我掌握感，而是有更多要負擔的責任與壓力感受(Plug et al., 2003)。劉錦萍(2007)的研究比較家境清寒與一般大學生，也發現清寒大學生除了對整體生活滿意度較低之外，也比較無法肯定自己人生道路的發展。此外，該研究清寒學生當中有五分之

一患有嚴重的憂鬱問題，甚至出現自殺想法。儘管這些研究都有方法與抽樣上的限制，但也提供部分資訊，讓我們了解生長在貧困下，青年對於現況生活與未來發展的預期如何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相對而言，一般家庭的兒少在成長過程可能較被保護，父母也比較會規範孩子的行為包括返家時間、幾歲可以結交異性朋友、關注青年子女的職業選擇與生涯發展方向，積極提供協助甚至過度保護而限制了青年的自主與選擇權。故達到成人對這些青年來說，代表的是更多自主與選擇，有助提高人生掌握感，故有益心理健康。

不難想像，若無家庭經濟支持，大學生每週大約需要花15–20小時在兼職工作上，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開銷。而公立與私立大學的學費有2倍以上的差異，這也意味者大部分弱勢家庭青年上了私立大學之後，需要花更多時間賺錢才得以支付學雜費，或是需要背負更多的貸款，資源分配不平等長期下來，期望透過高等教育翻轉貧困青年的社會階級仍有高度困難(楊瑩，2014)。由於要因應上課、交作業、考試甚至實習或練習等學業基本要求，若加上這些工作的時間成本，則大幅度降低年輕人規律探索及參與其他活動的機會，或得犧牲睡眠，緊湊地往返不同地方，這都提高疲憊感與壓力感受，不利身心健康(Cho & Lee, 2019)。家境好的學生，較能自由選擇是要透過工作培養獨立性，或是要投入跟興趣或自我發展有關的學習與準備，且追夢過程有家庭的協助，遇到挑戰能無後顧之憂，放寬心胸體會多元世界，並在克服挑戰後對自己更有信心(李易駿、古允文，2007；Plug et al., 2003)。低社經青年較少有機會獲得他人資助以追求夢想，若在原先繁忙的學習與工讀生活中，外加家庭照顧責任，極可能榨乾他們少許可自由運用的時間與收入，這些累積的壓力將嚴重威脅其心理健康，甚至未來發展(Arnett, 2016a; Boumans & Dorant, 2018)。上述說明何以自認已經是成人的貧困青年有極高的憂鬱情緒，並且需要心理衛生與社會福利的關注。儘管如此，上述的解釋仍有待研究進一步驗證。

(二) 建議

立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延續對上大學之經濟弱勢青年的協助

即使大學生比兒少更有自我照顧能力，家庭經濟仍持續影響其心理健康。臺灣福利服務涵蓋多類弱勢族群，但是相對輕忽經濟弱勢青年的需求。未滿18歲的貧困兒少可穩定取得補助，但是18歲福利身分改變，可能使青年與原有的支持系統產生斷裂(胡中宜、彭淑華，2013)。建議考量大學生發展性需求，納入服務規劃的指引，強化這些青年安心就學並積極促進其正向發展。社福機構提供服務時，除了關注服務對象外顯的功能與適應也需注意其內在需求與情緒議題。學校端也可透過新生訓練初步了解學生家庭經濟狀況，自評是否是成人，連結校內工讀機會、獎學金與輔導資源，以及校外社會福利資源共同協助學生並適度強化家庭支持，這些都有助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

2. 提升校園內對青年心理健康需求的敏感度與處遇能力

透過大學階段的處遇服務與支持協助，有助提升青年後續的心理健康發展。校園內首要加強老師甚至同學們對經濟弱勢家庭青年處境的了解。由於大學師生互動不若中小學頻繁，若學生不主動提起自己家庭狀況，同儕與老師也大多不了解學生的遲到、缺席或不夠專注在課業或活動上背後的苦衷，而容易對這樣的學生貼上負面標籤。強化一般民眾、學校老師與同學對經濟弱勢族群需求的了解，可以降低負面標籤，提高敏感度及早發現需要協助的同學。再者，從臨床工作與復原力文獻可知，生長在逆境但表現優異者因為社會功能佳(例如：上大學)，更容易讓人忽略其內在需求(陳杏容，2018；Hooper et al., 2011)。部分人有高獨立性甚至領導特質，可能很早就背負照顧責任，有些人甚至在成長過程無暇跟同儕發展與維繫關係，或參與有助長遠生涯發展的學習，甚至一直肩負著不符合年齡、能力或體能的照顧性活動，且長期掛念家庭需求，若加上缺乏適度紓壓，對身心健康危害甚大，嚴重者可能發展出自我傷害或物質濫用來因應情緒或壓力問題(吳書昀，2011；Hooper et al., 2011; Padilla-Walker, Nelson, & Carroll, 2011)。故強化校內師生(包括貧困大學生)了解家庭經濟狀況與心理健康的關聯，適度引進校內外資源，避免貧困青年承擔過高的壓力，有助避免過度勞累與缺乏社會支持的生活型態影響其心理健康。額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也發現不穩定跟心理健康密切的關聯性，考量大學生會經歷多重

角色與轉換，包括一般性的任務完成、新事物的體驗或人際關係的變化，因此不穩定與挫折感是探索過程無法避免的經驗(Messersmith & Schulenberg, 2010; Nelson & Barry, 2005)。故建議在大學校園經常性舉辦壓力因應相關教育講座或諮商輔導等服務，提升學生有效的情緒調節、問題解決、認知評估等壓力因應能力。

3. 建立圓夢機制並提高探索新事物的機會

考量貧困者在「實驗性」探索的程度較低，但是本研究也發現實驗性、專注自我跟心理健康密切關聯，故提升青年的心理健康，除了建立一般性的機制讓青年多方嘗試有益身心的活動，探索與培養嗜好之外，針對貧困大學生可能更需要強化鼓勵，並協助降低他們在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這樣方能確保他們跟其他青年有一樣的機會。尤其是高自費的活動(如：出國交流)，容易排除貧困者的參與。在國內針對貧困家庭的質化研究發現，那些長年成長在貧困中但是上大學的青年，對物質生活不如同儕多能坦然接受，但是對於自己成長過程中因為家庭經濟能力無法支持其去外地旅行，尤其是跟出國參訪學習有關的學校活動產生遺憾。未來畢業也計畫馬上投入職場，工作賺錢，不像同學還可以考慮透過旅遊等方式拓展視野，或是專心準備繼升學考試(陳杏容，2018)。為了促進每位青年都有相近的機會，透過正向探索經驗提高對自我與世界的認識，建議設立專款支持家境弱勢的學生，並在活動宣傳品上，說明費用可因經濟狀況進行調整。再者，可參考新北市中等教育設立之圓夢機制⁴，並依照大學生的需求適度修改評估機制，以縮短貧困大學生與一般學生在探索與圓夢機會的差距。

要將有興趣的事轉變成專長，需要投入長期的時間與資源。不論是從實務觀察或是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都發現，貧窮會使個人傾向選擇短期可見的利益，以確保當前生活安全，若缺乏適當的誘因與支持，貧困者較少投資時間在有利長遠健康或是財富之選項 (Banerjee & Duflo, 2011)。一些經濟弱勢青年，因為有沉重的家庭負擔，早早投入就業市場，多低估自己的潛能與職場價值(陳杏容，2018；楊育儀、陳秀芬，2018)。要改變這現象，需要有穩健鼓勵金以專款專用的方式長期支持貧困大學生，方能改善學生長期從事低技術門檻，但無助於專業技能與資歷發展的兼職工

4 由學生決定那些願望需要被支持，再由學校社工綜合考量後，推薦獎助之人選。

作，持續下來或許能帶來漣漪效果，降低他們畢業後從事低門檻且容易被取代的工作，繼而可避免在中晚年落入高貧窮與高憂鬱的世代循環(Roy et al., 2014)。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企圖改善過去研究在樣本上的限制，期能涵蓋臺灣與金門各地之公私立大學、科系以及不同家庭經濟背景者，以探究家庭經濟、成年初顯期特徵、成人地位與心理健康之關聯。在研究規劃上，盡量包含臺灣各區的公私立大學，且透過抽獎回饋受訪者的方式，期能取得多樣的家境學生樣本。儘管有這些努力，本分析樣本不具有全國大學生的代表性，抽樣時也未含技職院校，受訪對象7成是女性，比較偏女生視角，結果推論上仍有其限制，尤其貧困且未上大學者，或者在成年初期已經就業者的生活脈絡跟本樣本可能極為不同，有待後續研究。另一方面，Arnett(2016a)回顧文獻後指出，成年初顯期的研究以女性受訪者為主(大約6至7成)，故本研究雖偏重女性受訪者，但結果和國外研究的對話上，未必是個限制。

在測量工具使用上也有一些提醒，感覺介於中間的信度較低。再者，雖然實證支持心理健康與受訪者主觀的家庭經濟狀況有關(Zorotovich et al., 2016)，本研究亦採納個人主觀評估方式，然而僅由一個題項來判斷仍有限制，未來研究可納入多元測量指標，並比較結果的一致性。本研究並無測量可用以了解貧困大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包括如何分配時間與資源在打工或是進行其他活動，儘管可從既有的實證與教育場域觀察出一個概況，但是既有的研究與數據年代久遠，或受限於特定區域樣本，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增加相關變項全面進行調查。並進行質化研究，拓展多元樣本，包括學校與區域，透過深度訪談能更具體掌握青年的心理健康如何受到家庭經濟、成年初期特徵的影響。再者，考量不同家境之學生就讀公私立大學的學習或後續發展等相關研究仍十分有限，建議未來透過長期追蹤研究持續了解，從兒少時期就開始追縱，且設計多元資料提供者(例如：父母提供家庭經濟資訊)，將有更完整資料可以檢視成年初顯期理論在不同家境青年的適用性，甚至進一步探究瞭解高等教育對不同階級背景學生的短中長期影響，包括在校學習狀況、生涯發展、心理健康與階級流動的變化。

謝 誌

研究者感謝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助理們的行政與文獻協助，以及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補助：「成人初顯期的特徵與發展結果：探討家庭社經地位與文化的影響力」(MOST 105-2410-H-003 -024 -SS2)。

參考文獻

-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台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yo-yo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7**，105-152。doi: 10.29816/TARQSS.200709.0003
- 李金治、陳政友(200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四年級學生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與其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學校衛生**，**44**，1-31。doi: 10.30026/CJSH.200406.0001
- 呂朝賢、陳柯玫、陳琇惠(2016)。主觀貧窮輪廓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3)，341-376。
- 吳書昀(2011)。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照顧經驗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2)，79-140。doi: 10.6785/SPSW.201112.0081
- 胡中宜、彭淑華(2013)。離開安置機構青年之自立生活現況與相關經驗初探。**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1**，49-80。
- 胡蘭沁(2007)。大學生之背景、生活型態及兼職工作對其消費決策型態及消費類型影響力之探討。**人文研究學報**，**41**(2)，99-124。doi: 10.7029/JHSS.200710.0099
- 陳世佳(2008)。台灣大學生工讀現象。**台灣高等教育電子報**，**11**，1-15。
- 陳杏容(2016)。家庭危險因子對少年之學業成就、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發展的影響：累積危險指數模型的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4**，39-82。doi: 10.6171/ntuswr2016.34.02
- 陳杏容(2018)。貧困家庭的成長經驗：成人看法、求學、交友、親密關係與職涯發展。**臺灣社會學會學術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

- 陳杏容、陳易甫(2019)。早期家庭經濟弱勢與成年初顯期發展成果之潛在剖析分析與其影響因子。**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2**(1)，89-118。doi: 10.30074/FJMH.201903_32(1).0005
- 陳婉琪、徐崇倫(2011)。愛的教育，鐵的紀律？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教育研究集刊**，**57**(2)，121-154。doi: 10.6910/BER.201106_(57-2).0004
- 陳雅鈴(2006)。貧窮如何影響孩童。**教育研究月刊**，**146**，87-101。
- 教育部統計處(2019)。**教育統計指標之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原始數據】**。未出版之統計數據。取自<https://bit.ly/2T2E0G4>
- 勞動部(2006)。**九十五年大學生打工狀況調查報告：提要分析**。取自<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95/9507menu.htm>
- 楊育儀、陳秀芬(2018)。從自我決定理論探究經濟弱勢大學生之生涯決定。**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6**(3)，1-33。doi: 10.6151/CERQ.201809_26(3).0001
- 楊瑩(2014)。我國高等教育受教機會公平性之探討。載於中國教育協會(主編)，**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247-284頁)。臺北市：學富文化。
- 廖小雯、程景琳(2011)。成年初顯期的自我認同狀態、自我定義記憶之解釋歷程與心理幸福感之關係探討。**應用心理學**，**51**，79-110。
- 數字科技研究(2019)。**小雞上工：2019全台暑假打工數據報告**。取自https://www.chickpt.com.tw/docs/chickpt_summer_report2019.pdf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106年死因統計年報電子書【原始數據】**。未出版之統計數據。取自<https://dep.mohw.gov.tw/DOS/cp-3960-43792-113.html>
- 劉錦萍(2007)。家境清寒大學生幸福感與社會支持的調查研究—以輔大進修部為例。**全人教育學報**，**1**，179-207。doi: 10.6272/JHE.2007.01.10
-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doi: 10.6277/ter.2002.301.5
- 賴怡芳(2014)。**理想與現實之間！自行負擔費用的大學生之生活**(未出版碩士論文)。靜宜大學，臺中市。
- Andresen, M. E., & Havnes, T. (2019). Child care, parental labor supply and tax revenue. *Labour Economics*, *61*, 1-19. doi: 10.1016/j.labeco.2019.101762

- Arnett, J. J. (2012). New horizons in research on emerging and young adulthood. In A. Booth, S. L. Brown, N. S. Landale, W. D. Manning, & S. M. McHale (Eds.), *Early adulthood in a family context* (pp. 231-244). New York, NY: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614-1436-0_15
- Arnett, J. J. (2016a). College students as emerging adults: 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llege context. *Emerging Adulthood*, 4(3), 219-222. doi: 10.1177/2167696815587422
- Arnett, J. J. (2016b). Does emerging adulthood theory apply across social classes? National data on a persistent question. *Emerging Adulthood*, 4(4), 227-235. doi: 10.1177/2167696815613000
- Baggio, S., Iglesias, K., Studer, J., & Gmel, G. (2015). An 8-item short form of the inventory of dimensions of emerging adulthood (IDEA) among young Swiss men. *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 38(2), 246-254. doi: 10.1177/0163278714540681
- Banerjee, A. V., & Duflo, E. (2011).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 Boumans, N. P. G., & Dorant, E. (2018).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experiences of young adult carers compared to young adult noncarers: Parentification, coping and resil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 32(4), 1409-1417. doi: 10.1111/scs.12586
- Burton, L. (2007). 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Family Relations*, 56(4), 329-345. doi: 10.1111/j.1741-3729.2007.00463.x
- CESD-R (n.d.). *Depre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cesd-r.com/depression/>
- Cho, A., & Lee, S. (2019). Exploring effects of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on adult-depressive symptoms in Kore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5(4), 801-813. doi: 10.1002/jclp.22737
- Costello, E. J., Compton, S. N., Keeler, G., & Angold, A. (2003).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and psychopathology: A natural experiment. *JA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 Medical Association*, 290(15), 2023-20029. doi: 10.1001/jama.290.15.2023
- Côté, J. E. (2006). Emerging adulthood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moratorium: Risks and benefits to identity formation. In J. J. Arnett, & J. L. Tanner (Eds.), *Emerging adults in America: Coming of age in the 21st century* (pp. 85-11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oi: 10.1037/11381-004
- Côté, J. E. (2014). The dangerous myth of emerging adulthood: An evidence-based critique of a flawed developmental theory.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8(4), 177-188. doi: 10.1080/10888691.2014.954451
- Dcard (n.d.). 大學生活沒想像中快樂。 Retrieved from <https://bit.ly/2Tf9GJ6>
- Guo, D.-Y. (2017). Caring-for-Self of undergraduates: An investigation of what undergraduates concer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4), 591-610. doi: 10.6251/BEP.20160825
- Haworth, C., Carter, K., Eley, T. C., & Plomin, R. (2015). Understanding 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specificity and overlap between well-being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2), 1-9. doi: 10.1111/desc.12376
- Hooper, L. M., DeCoster, J., White, N., & Voltz, M. L. (2011). Characteriz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7(10), 1028-1043. doi: 10.1002/jclp.20807
- Johnson, M. K., Berg, J. A., & Sirotzki, T. (2007). Differentiation in self-perceived adulthood: Extending the confluence model of subjective age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0(3), 243-261. doi: 10.1177/019027250707000304
- Lin, C. H., Lee, S. M., Wu, B. J., Huang, L. S., Sun H. J., & Tseng, H. F. (2013).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Taiwanese ver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five well-being index.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27(4), 331-331. doi: 10.1111/acps.12040
- Lisha, N. E., Grana, R., Sun, P., Rohrbach, L., Spruijt-Metz, D., Reifman, A., & Sussman,

- S. (2014). 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revised inventory of the dimensions of emerging adulthood (IDEA-R) in a sample of continuat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Evaluation & Health Professions*, 37(2), 156-77. doi: 10.1177/0163278712452664
- Messersmith, E. E., & Schulenberg, J. E. (2010). Goal attainment, goal striving, and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 ten-year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10(130), 27-40. doi: 10.1002/cd.279
- Nelson, L. J., & Barry, C. M. (2005).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emerging adulthood: The role of self-classification as an adult.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0(2), 242-262. doi: 10.1177/0743558404273074
- Nelson, L., Badger, S., & Wu, B. (2004).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in emerging adulthood: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1), 26-36. doi: 10.1080/01650250344000244
- Padilla-Walker, L. M., Nelson, L. J., & Carroll J. S. (2011). Affording emerging adulthood: Parental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their college-aged children.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9(1), 50-58. doi: 10.1007/s10804-011-9134-y
- Plug, W., Zeijl, E., & Bois-Reymond, M. D. (2003).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s on youth and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6, 127-144. doi: 10.1080/1367626032000110273
- Reifman, A., Arnett, J. J., & Colwell, M. J. (2007). Emerging adulthood: Theory,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Youth Development*, 2(10), 1-12. doi: 10.5195/JYD.2007.359
- Roy, K., Messina, L., Smith, J., & Waters, D. (2014). Growing up as man of the house: Adulthood and transition into adulthood for young me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43,

55-72. doi: 10.1002/cad.20054

- Skulborstad, H. M., & Hermann A. D. (2016). Individual difference predictors of the experience of emerging adulthood. *Emerging Adulthood*, 4(3), 168-175. doi: 10.1177/2167696815579820
- Smith, D. C., Bahar, O. S., Cleeland, L. R., & Davis, J. P. (2014). Self-perceived emerging adult status substance use.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8(3), 935-941. doi: 10.1037/a0035900
- Van Dam, N. T., & Earleywine, M. (2011). Validat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revised (CESD-R): Pragmatic depression assessmen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Psychiatry Research*, 186(1), 128-132. doi: 10.1016/j.psychres.2010.08.01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October 2). *Mental health: A state of well-be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mental_health/en/
- Zorotovich, J., Johnson E. E., & Linn, R. (2016).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positive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ong emerging adult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50(4), 624-635. doi: 10.1177/2167696819848242

附錄1 成年初顯期面向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面 向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認同探索	12. 自我探索的時間	.61
	23. 獨立於父母之外的時間	.31
	24. 定義自我的時間	.77
	25. 規劃未來的時間	.74
	26. 尋找意義感的時間	.78
	27. 決定自我信念與價值的時間	.79
	28. 學習為自己思考的時間	.74
實驗性	1. 很多可能性的時間	.66
	2. 探索的時間	.70
	4. 嘗試的時間	.73
	16. 很多選擇的時間	.57
	21. 嘗試新事物的時間	.73
不穩定	3. 困惑的時間	.33
	6. 感到受限的時間	.46
	8. 備感壓力的時間	.78
	9. 不穩定的時間	.58
	11. 高壓力的時間	.71
	17. 不可預測的時間	.32
	20. 充滿擔憂的時間	.65
專注自我	5. 個人自由的時間	.53
	7. 為自我負責的時間	.46
	10. 樂觀的時間	.41
	15. 獨立的時間	.59
	19. 自給自足的時間	.38
	22. 專注於自我的時間	.53
專注他人	13. 安頓下來的時間	.58
	14. 對他人負責的時間	.70
	18. 對他人承諾的時間	.59
介於中間	29. 在某些方面覺得是成人的時間	.78
	30. 漸漸成為成人的時間	.81
	31. 不確定自己是否已進入成人期的時間	.20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Adulthood, Mental Health, and the Family Financial Condition

HSING-JUNG CHEN

Purpose: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adulthood has been broadly examined in western societies, but several knowledge gaps are evident. The first is a lack of research using non-white participants with diverse socioeconomic family backgrounds that takes well-being into account when considering mental health. Second,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mily poverty causes children to mature early, limits young people's self-exploration, and prevents them from choosing their desired lifestyle. Hence, young people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may exhibi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emerging adulthood. Empirical evidence has also long support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poverty and poor mental health. However, whether adulthood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is question by conduct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of data from 1,444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Results:** We identified 3 major findings: (1) Poor students had lower scores on experimentation and feeling in between youth and adulthood. (2)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experimentation and self-focused characteristics ar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mental health, whereas instability is a risk factor for mental health. After controlling for characteristics in emerging adulthoo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still predicted mental health with significant accuracy. (3) Adulthood had moderating effects. Poor students who were adults had the worst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s:** Three suggestions regarding policies and servi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re provided: (1)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poverty, continue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disadvantaged youths who go to college; (2) enhance school counselors' ability to identify disadvantaged youths early so as to serve them better; (3)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fulfilling the dreams of disadvantaged youth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mental health, poverty, well-being

Hsing-Ju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enhjntnu@gmail.com)

